

清教徒神学与文化宣教

——试析赵天恩牧师“三化异象”与基督徒的教牧侍奉

王志勇 牧师

本文基于对圣经启示、教会传统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而提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化，中国文化的基督化，而核心就是华人教会的国度化。这一出路就是赵天恩牧师所提出的“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与文化基督化。¹“三化异象”的核心就是建立“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天国文明。这种文明所要解决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更是直接面对人类的原罪和人性的幽暗，指明罪人在耶稣基督里出死入生、得见天国、最得赦免、得胜得荣的生命之道。

1999年冬天，我和赵天恩牧师在北京见面，赵牧师就开始把“三化异象”分享给我，中间又亲自教导我明白改革宗神学大师范泰尔所提倡的“前提论护教学”

(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特别是其中普遍恩典的教义。赵牧师特别嘱托我，一定要运用普遍恩典的原理把西方改革宗神学处境化，从而发展出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本土化和处境化神学来，解决长期以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水油二分的困局，推动“三化异象”的实现。可惜赵天恩牧师在世之时忙于为中国家庭教会辩护和募款，又在2004年突然患病去世，未及对“三化异象”的圣经与神学内涵进行详尽的阐述，尤其是“三化异象”所依据的改革宗神学更是当今许多华人所忽略

¹ 又称“中华民族福音化”、“华人教会基督化”、“中国文化基督化”，参考中国福音化（香港）网站，<http://cmi-hk.org.hk/content.asp?page=AboutUs&subpage=Home>。这种表达更加完美地表达了“三化异象”的精髓，尤其是弱化了政治化的“中国”，免得使人误解“三化异象”的中心是“中国”！“三化异象”首先指向“中华民族”，强调各个民族之间在耶稣基督里的和解与合一，而非撕裂与对立；“华人教会”则指向普世性的华人教会群体，既包括中国大陆的华人教会，也包括台湾、香港以及处于其他国家的华人教会，免得我们把“教会国度化”仅仅指向中国大陆的教会，甚至变相地成为以“中国大陆的教会”为宣教和侍奉的中心。“中国文化”则是指向以中文为载体的文化，这种“中国文化”不受政治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局限。本书所指的“三化异象”直接指向这种表达。

的。没有明确的改革宗神学的规范和引导，“三化异象”就会成为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宗教口号，丧失预定论所带来的确信、文化使命所赋予的导向、圣约神学所提供的框架、圣灵论所强调的大能、教会论所带来的制度性的更新。严肃地说，如果不以严谨的改革宗神学为基本框架和指南，所谓的“三化异象”不仅没有任何内涵，也没有任何可供落实的原理和规范，只能被教会内外各种人士滥解滥用。

赵天恩牧师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恩人，是中国大陆 1949 年以来改革宗神学最早的推动者，也是中国教会众多后起牧者的恩师。他本来可以静坐大学或神学院办公室之内从事神学研究，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灾难深重的大陆和中国教会，尤其是奉献给了那些在无神论政府打压之下的“家庭教会”。² 在其相对短暂的一生中，赵牧师不仅参与、协助了港台众多神学院的建立（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道生神学院、香港的中国宣道神学院等），并且成为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众多领袖和工人神学的的师长和对外的发言人，他还亲自辅导、影响和感化了相当一部分有志青年从事牧会和神学教育，比如现在加州风声神学院的王伟成院长、河南信仰基督教合一教会张义南牧师、牛津大学的陈益教授、“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哥伦比亚神学院徐志秋牧师、加拿大维真学院葛拥华教授、华人布道家张伯笠牧师、加拿大信友堂洪予健牧师、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牧师、独立作家余杰、画家朱久阳等等。笔者在改革宗神学之学习、翻译、教学、写作和教牧上多方直接从赵牧师当面受教，耳提面命，获益匪浅，更是直接从赵牧师领受了“三化异象”，并把西方经典性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处境化视为一生的使命。

可惜，最近教会内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把赵牧师污名化，认为他是“党国基督徒”。³ “文化基督化”更是受到中共御用学者的歪曲和攻击，认为这是海外发反华势力使徒颠覆中国目前政权的策略。当然，身为改革宗神学家，赵天恩牧师并没有回避极权政府的邪恶，很多人因为惧怕的缘故不愿意面对政权的邪恶，而赵牧师则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感强壮胆，直接指出：“一个禁止传福音的极权政府，乃是自行扮演敌挡基督的角色，成为复活基督的‘属灵’仇敌。禁止传讲天国的福音就是抗拒

² 参考《薪尽火传：赵天恩牧师纪念文集》（台北：中福，2005年）。

³ 参曾庆豹，《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护教反共、党国基督徒与台湾基要派的形成》（台北：台湾教会公报社，2017年）。

进行中的天国。所以基督徒对一个逼迫教会的无神论政权的态度，必须针对政府背后那股敌基督的邪灵。”⁴ 在教会内部有人认为，耶稣基督在升天前所吩咐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既没有文化使命，也没有社会使命，更没有政治使命。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赵牧师对上帝的国度和主权的强调被贴上“神权政治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的标签，并且直接与“美国对华宗教渗透”联系在一起，强调赵牧师的“三化异象”带有明确的“政治化”的导向，就是“以‘宗教为第一自由’为诉求，以海外民运势力互为依托，以大陆家庭教会为操纵对象，整合国内外反华力量，旨在推动中国激进社会变革。该意识形态的主要着力点则在于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割裂‘爱国与爱党’，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⁵ 这些可怜的御用学者，他们不敢斥责那些窃夺国家权力、践踏人民自由的暴君酷吏，却对基督教和传道人露出可憎的獠牙，企图通过“政治化”的手法来消除赵天恩牧师及其“三化异象”在中国教会内部的积极影响。针对以上各种形式的误解和曲解，我们确有必要根据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阐明“三化异象”的圣经依据和神学内涵，好使上帝的子民明白真理与真相。

当然，任何好东西都存在被滥用的倾向，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堕落后的世界里，这种现象是必然出现的，撒但就善于在我们播下麦种的地方播下稗子，并且稗子也长得非常像麦子（太 13:24-30）。有时我们急于分辨真假，并且一定要把稗子薅出来，但上帝的旨意却是：“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太 13:30）。因此，我们也不排除教会内部确实有人把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当作“民运”与“维权”的旗帜，忘记了圣经所强调的建制性教会和牧师的基本职分，从祈祷、传道与牧灵转向街头政治和群众运动，认为这就是“三化异象”的展开和实现。其实，在“三化异象”中，“中国福音化”才是根本，“教会国度化”乃是枢纽，“文化基督化”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没有“中国福音化”所带来的人类心灵的更新和品格的改变，没有“教会国度化”所塑造的教会在教导和建制上的归正，所谓的

⁴ 赵天恩，《洞烛先机》（台北：中福出版社，1993年），170页。

⁵ 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2月。

“文化基督化”就会走向“自由化”，缺乏内在生命的操练，最后只能是利用基督教教义和教会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本质上不过是在公共领域中搞一些笨拙的宗教、道德与政治表演而已，并不能够给人心和文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因此，不强调“中国福音化”，不落实“教会国度化”，我们所谓的“文化基督化”最终必然会成为自由派利用圣经和教会改造社会的工具。当然，我们不必诛心问罪，也不必互相猜疑，口诛笔伐，指责到底是谁在利用“三化异象”，到底谁在利用基督教搞“民主”、“宪政”，只要本着我们的良心，按照上帝量给我们的疆界，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就好了。

必须指出的是，文化宣教是唐崇荣牧师首先倡导和力行的，他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大有能力地传讲改革宗神学和文化使命，并且在雅加达建立印尼最大的教堂，附设音乐厅、神学院、博物馆和基督徒学校，全方位地展现了基督教文化宣教的使命和理念。⁶ 我的另外一位恩师陈宗清牧师本着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三化异象”，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宣教”的异象，强调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平衡，并且创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强调“福音转化中华魂，真道重建世界观”。这种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平衡也就是祝健牧师强调的国度连接的模式中的“两个翅膀”。⁷ 靠着上帝的恩典，笔者在赵天恩牧师和陈宗清两位恩师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督教文明论的主张，强调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的正传就是建立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特色的基督教文明。二十几年来，从赵天恩牧师所归纳的“三化异象”，再到陈宗清牧师提出的“文化宣教”，此外就是笔者所强调的以基督教世界观和文明论为蓝图的“文明重建”，这三者乃是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发展的三大落实和提升，代表了从神学、世界观到文明论的递进性强调和展开。笔者深信，“三化异象”、“文化宣教”与“文明重建”这三大强调不仅对于华人教会在神学和宣教上也有提醒和促进作用，对于普世教会也是重大的亮光和赐福，求主使用。

⁶ 参考唐崇荣，《归正福音运动：回顾与前瞻》（台北：唐崇荣国际布道团编辑团队，2010年）。

⁷ 祝健，“国度连接与未来中国三件大事”，见王志勇《圣经圣灵与圣徒：三源合流与雅和博经学的精华》（美国：润邦，2016年），II，388-389页。祝健牧师强调“国度连接的模式”的“一、二、三”，“一”就是国度观念的异象，就是教会不能局限于本地的需要，要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二”就是两个使命，也就是福音宣教的使命与文化更新的使命；“三”就是教会内部注重圣经启示和纯正教义、注重圣灵充满和敬虔生活、注重圣徒相通和文化更新的三大传统和群体之间在国度异象上的合一，也就是“三源合流”。

一、清教徒神学与文化基督化

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处境化，我们绝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明确地继承、转化、传讲以《威斯敏斯德准则》（《威斯敏斯德信条》、《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和《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为教义规范的清教徒传统。⁸ 清教徒传统不仅具有深刻的合乎圣经的神学思想，并且具有整全有力的世界观和文明论。⁹ 在目前面对世界观与文明论之争战空前强烈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清教徒的传统，返本开新，重新建构我们当有的合乎圣经和教会正传的世界观与文明论。

对于清教徒而言，他们所面对的选项就是：到底是离经叛道，假冒伪善，还是成圣成贤？（Ultimately the Puritan was faced with the alternatives of apostasy, hypocrisy or sainthood）。¹⁰ 秉承清教徒的精神，我们在本书中不仅强调微观性、个人性的“成圣成贤”，就是基督徒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强调宏观性、公共性的“新天新地”，就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不断的展开和成全。因此，对于清教徒而言，“文化基督化”就是要把上帝的圣言与基督的救赎应用到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建立以宪政、民主、法治、共和为特色的基督教文明。¹¹ 当然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时下西方流行的那种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的宪政民主，而是以基督教真理为根基的神权神法之下的宪政民主。¹² 著名清教徒经学家马太·亨利解释《马太福音》28章19节“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时强调，基督徒当“竭尽全力使所有的国

⁸ 参阅王志勇“清教徒神学三部曲”：《清教徒之约：威斯敏斯德准则》（上海：三联，2012年）；《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台北：基文，2011年）；《圣约经学与中国未来：清教徒精神与中国教会和社会的转型》（台北：橄榄，2015年）。另外参考钟马田等著《清教徒的脚踪》，梁素雅、王国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利兰·赖肯，《入世的清教徒》，杨征宇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

⁹ 参阅王志勇“清教徒世界观三部曲”：《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台北：基文，2013年）；《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写给华人教会的公共神学》（台北：橄榄，2014年）；《基督教文明论》（台北：主流，2017年）。

¹⁰ John Marlowe, *The Puritan Tradition in English Lif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56), p. 135.

¹¹ 参考道格拉斯·F·凯利，《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王怡、李玉臻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¹² 河南信阳基督教合一教会牧师张义南弟兄强调“调基督教二次改革”，其要旨就是：“使基督徒的信仰更加纯正、更加圣洁，基督徒与主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全面的准确的领受圣经真理。恢复正确的圣传。将基督教内的掺杂、妥协、分裂、短视、边缘化、贫困化、世俗化剔除出去。将东方风俗、封建迷信和西方民主、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督教内过滤出来。”张义南牧师执笔，《基督教二次改革》，三稿（基督教合一教会，2015年），9页。这种主张反映了中国大陆教会回归圣经和教会正传的热心，可惜本书缺乏比较系统、全面、深刻的神学阐释，过分强调“天堂和地狱神学”，对于圣经启示和宗教改革所阐明的圣约与国度神学缺乏认识，过分强调“天堂和地狱神学”。

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do your utmost to make the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¹³ 笔者深信，这种从个人性到公共性的全方位的追求敬虔乃是清教徒真正的精神，这种精神必然落实在爱主爱人、道化世界的使命意识上！离开这种崇高的使命意识，我们领受的基督教只能是木乃伊一般的僵尸，不管包裹的如何漂亮，不管如何满足个人的宗教感觉，都没有改变世界、再造文明的力量。一旦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功用，最终我们或者是被践踏在脚下自怨自艾，或者是效法这个世界，甚至同流合污，并没有别的选项。那些试图逃避世界的人，并不能够真正地逃避世界，最终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更有甚者，一旦丧失这种依靠上帝、面向世界的导向，我们所领受和传递的基督教就会成为毒化他人心灵的鸦片，只能麻醉人们的神经，摧毁人们的大脑，却无法使人真正得享个人心灵与社会制度上双重性的医治和自由。

面对当今社会中盛行的心灵与社会的失序，面对高科技装备下个人的放纵与国家的专横，我们重新强调圣经启示和教会认信的国度异象与文化使命，为教会和社会提供一种主体与客观结合、神秘与理性兼备、结构与根基相融的世界观与文明论体系。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帮助个人在心性生命上成圣成贤，完善内在的心灵秩序，并且能够帮助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建制立法，移风易俗，重建外在的社会秩序。我们必须再次回归上帝的国度的异象与愿景，才能够代替教会内外盛行的各种狂热与无奈。赵天恩牧师所提倡的“中国福音化”就是福音使命，“文化基督化”就是文化使命，而“教会国度化”就是教会要从上帝的国度的角度来平衡地对待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基督化”虽然强调文化使命，但绝不是排斥福音使命。赵天恩牧师强调：“罪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产生的影响说明了中国人需要救赎，中国文化需要基督化。毕竟普遍启示不能彰显基督，也不能清楚揭示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旨意。”¹⁴ 因此，基督徒从事“文化基督化”的工作不是泛泛而论的文化工程，而是始终凸显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始终强调福音的信息。可以说，“文化基督化”本身就是“中国福音化”与“教会国度化”的顺延与落实。这就是说，一个接受福

¹³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vol. 5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11), p. 362.

¹⁴ 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06年），13页。

音、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必然参加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必然接受圣经中所启示的世界观的装备，最终也必然在具体的生活中见证福音，而这种见证必然是文化性的见证。因此，赵天恩牧师强调：“一旦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到上帝救赎的大能，就会明白自己的同胞是在迷失的光景中；很自然地，我们会想与他们分享福音，体验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这种向同胞传福音的渴望，就是中国文化基督化的起步。”¹⁵ 因此，我们绝不可把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隔绝或对立起来。福音使命的核心是教育性使命，就是塑造真正效法基督的基督化的圣徒，装备他们能够承担起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来。文化使命的核心当然也是基督化，就是赵天恩牧师强调的“文化基督化”，这种基督化就是“文明化”，正如苏格兰裔的美国牧师、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麦考什所强调的那样，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既是培养坚强的基督徒，也是培养真正有教养的文明人。¹⁶

从陈宗清牧师的研究和解释来看，“教会国度化”的核心就是“文化宣教”，通过文化使命促进福音使命，通过福音使命成全文化使命。不管是福音使命，还是文化使命，都是国度使命，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那样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太6:33）。当然，深入而言，上帝并没有赐给人两个使命，上帝从起初到末了赐给人的使命始终是文化使命，这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就赐给人的治理全地的使命（创1:28）。福音使命在本质上不是一个与文化使命截然不同的使命，傅瑞慕强调说：大使命在本质上与文化使命是同一个使命。实际上，“大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在堕落之人身上的应用。”¹⁷ 福音使命的本质绝不仅仅是让人“信耶稣，升天堂”，而是高举上帝的主权和救赎、以上帝的圣约和律法为经纬而进行的重建文化与秩序的使命。因此，福音使命不仅没有废除文化使命，反倒是文化使命的强化和成全。也就是说，福音使命的最终目的就是门徒训练，使人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当然，建制性教会和牧者当更多地专注于福音使命，而作为上帝的子民的教会则当更多地注重文化使命。牧师当以祈祷传道为念，不宜为争取“民权”、实现“民主”而参加“民运”，成为街头政治或暴力革命的领袖。

¹⁵ 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23页。

¹⁶ 阿瑟·赫尔曼，《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374-376页。

¹⁷ John Frame, *Sal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Phillipsburg: P&R, 2006), p.250.

因此，不管是“中国福音化”，还是“文化基督化”，二者都是以“教会国度化”为中心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真理乃是上帝的国度的真理，耶稣基督向门徒所传讲的乃是国度的福音，吩咐门徒首先追求的就是上帝的国度：“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 4:17）；“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即使在他复活之后，他向门徒反复强调的就是上帝的国度之事：“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的事”（徒 1:3）。耶稣基督首先所关注的并不是个人性的感觉和实现，而是把个人的感觉和实现向上帝的国度和公义，我们因得见上帝的国度而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定位，在对上帝所启示的公义的追求中找到个人使命的落实。个人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认罪悔改，进入上帝的国度，才能自觉地担负起治理全地、道化世界的国度异象和文化使命，才能真正达成个人的定位和实现。

上帝从始至终赐给我们的使命都是国度的使命，也就是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创 1:28；9:7；诗 8:6-8；罗 8:32）。如果我们逃避世界，就会被世界吞噬！如果我们逃避政治，就会被政治辖制！如果我们逃避文化，就是被文化蒙蔽！我们对于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责任是无可逃避、无可推诿的，因为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始终生活在世界、政治和文化之中。基督徒一致承认，这是天父世界，我们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对于这个世界及其政治与文化，我们既不要憎恶逃避，也不要对立斗争，当然也不要苟同妥协，而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面对，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勇敢地承担起上帝赋予我们的治理的使命和责任来，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世界、政治及其文化予以彻底的更新和成全，最终使人一切的心思意念都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正如保罗所言：“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3-5）。

虽然我们极其重视个人的得救，没有个人在耶稣基督里的得救，整个世界对于我们都没有任何意义，所谓的“政治”也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的文化也不过

是你方唱罢他登场，胜者王侯败者贼，本身并没有任何终极性的意义。因此，传扬福音，拯救灵魂，就是最大的天国政治！但是，作为基督徒，在强调传道牧灵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徒不能以个人的得救为终极目的，因为个人得救的目的是荣耀上帝，而荣耀上帝的方式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追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也就是承担国度异象，完成文化使命，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遵行并遵行上帝公义的律法，见证上帝的恩惠的福音，荣耀上帝的圣名。引导基督徒以个人的得救为基点，转向圣经中启示的国度异象和文化使命，乃是本书的主旨。

与“三化异象”相反，今日西方世界中盛行的乃是世俗化、多元化和相对化。世俗化把基督教作为宗教信仰而赶出公共空间，挤压到个人领域之中。多元化乃是直接引进与基督教异质的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使得基督教信仰逐渐丧失国教的地位。相对化更是直接消解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和律法的绝对性，使得严肃的信仰与价值的问题成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语词游戏。在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的狂潮大浪的冲击下，传统的宗教信仰的疆界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教会和国家都处于分崩离析的乱象之中。正如朋霍费尔所分析的那样：“西方由于失去了由耶稣基督的形象建立的统一而面临虚无。获释后的各种势力竞相喧闹。现存的一切都面临这毁灭的威胁。”¹⁸ 面对礼崩乐坏的乱局，教会必须重新复兴，重新担负其承先启后、再造文明的重任来。教会必须自觉地继承大公教会的正传，勇敢地传讲真理，整合各种力量，使其成为耶稣基督所使用的改变世界的精兵。正如朋霍费尔所言：“教会借着关于活着的主耶稣基督的消息来表明，教会要做的不仅仅是保存过去的东西。教会恰恰也强迫各种秩序力量聆听、悔改。然而，凡是来靠拢它的，接近它的，教会都不拒诸门外。教会听凭上帝对世界的统治来决定，上帝是否让各种秩序力量成功，教会——既保持同各种秩序力量的区别，又正直地坚持同它们的同盟——是否可以把父辈的福祉与过失所系的历史遗产继续传给未来。”¹⁹

¹⁸ 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北京：商务，2012年），93页。

¹⁹ 朋霍费尔，《伦理学》，97页。

二、道路、真理与生命

“三化异象”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纯正的教义，就是合乎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的正确教训。没有基于圣经和教会正传的纯正的教义，不管是什么样的“异象”，都不过是个人的幻想而已。“**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 29:18）。此处的“**异象**”本来就是指向上帝默示的真理。清教徒经学家马太·亨利解释说：“没有先知解释上帝的律法，没有祭司或利未人教导关乎上帝的知识，没有蒙恩之道，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上 3:1），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就会放肆。”²⁰

在雅和博经学中，²¹我们重新把赵天恩牧师提倡的“三化异象”与改革宗正统神学联系起来。改革宗正统神学是以十六至十七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成型的改革宗信条为界定的。这些信条是圣经启示和教父神学的正传。在这种正统神学中，其核心性的组成部分就是《约法十章》、《使徒信经》和《国度祷文》，我们分别称之为“道路”、“真理”与“生命”。“道路”强调的是文化使命，重视上帝的律法，这是“文化基督化”所特别强调的。“真理”强调的是福音使命，重视上帝的福音，这是“中国福音化”所特别强调的。“生命”强调的是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合一性，重视律法和福音在国度圣约的框架内的平衡，这是“教会国度化”所特别强调的。当然，终极而言，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他是上帝赐给我们在世上一切美善的集大成者，“**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

²⁰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Proverbs 29:18.

²¹ “**雅和博**”一词是希伯来文 אהבה (Ahavah) 一词的音译，在旧约圣经中就是“爱”的意思，相当于新约圣经希腊文中的“阿加佩” (ἀγάπη, agape, 有人翻译为“爱加倍”)。我们用“雅和博”这个词来强调爱者与被爱者之间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中文中特别把这种爱翻译为“圣爱”，首先强调上帝对人的圣洁之爱，同时也强调人对上帝当有的圣洁之爱，目的就在于把这种爱与各种违背上帝的圣洁和律法的污秽之爱分开。雅和博经学是西方改革宗正统神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本土化和处境化，就是运用中国文化中的文字和术语，针对中国社会具体处境，努力把西方基督教神学用精确、全面的形式表达出来，进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以圣经为根本、以历代大公教会正传为参照的神学体系，从而装备中国教会在真理上扎根长进。这一神学体系虽然也有自己的神学和宗派立场与归属，但却自觉地淡化、消除宗派性（改革宗与其他宗派）、地域性（西方与东方）和时代性（古代与现代）的壁垒，强调“圣而公之教会”、“圣而公之真理”与基督徒当有的“圣而公之生活”，更多地回归圣经本身，也就是“经学”。因此，笔者把这一神学体系称为“雅和博经学”，就是“圣爱经学”。雅和博经学强调上帝的爱，强调人的爱，强调以爱来感动中国，感动世界，“仁者无敌”（林前 13）。同时，雅和博经学也强调“仁教心学，法治德政”就是贯穿古今中西圣贤之学的内在理路和精神。

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奥古斯丁解释说，因为基督“为他的教会开了一条进入上帝的国和永生的路”。²²

在耶稣基督本身的教训中，他也向我们显明了“道路、真理和生命”。这种“道路”的概括就是《约法十章》，“真理”的概括就是《使徒信经》，“生命”的概括就是《国度祷文》。我们强调，上帝赐给我们的通天的“道路”就是以《约法十章》（出 20:1-17）为综述的圣约“法统”。这一“法统”所强调的是上帝亲自启示的以爱主爱人为导向的神圣约法，这种神圣约法为个人的心灵秩序的安顿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性架构”。此处的圣约是上帝的国度的宪章，此处的律法是上帝的国度的标准。圣约和律法合在一起就代表了上帝的国度的制度，对于制度的重视在圣经启示中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而这恰恰是今日基督教所普遍忽略的。当然，正如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那样：“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 2:27）。上帝赐给人圣约和律法的目的在于使人得福：“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申 5:29）。圣约和律法是不可分的，上帝所立的圣约必然有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不是机械地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乃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标准，强调的乃是我们本有的与上帝相属相爱的关系，这律法指明我们通向上帝的道路、效法上帝的模式、成圣成贤的路径、治国安邦的蓝图。我们在本书中常常将“圣约”与“律法”两者合称为“约法”，其实上帝的律法本身就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标准，乃是“约法”。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就在西奈山立约赐律，并且明确强调：“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出 19:5-6）。这种对于遵守圣约的强调，乃是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的重要标记。要实现“文化基督化”，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特别启示的国度性的圣约和律法，否我们我们在思维和行动上既没有合理的框架，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我们所谓的“文化基督化”不过是空喊口号而已。几百年来，不管是基督教内部的基要派，还是自由派，我们共同的问题就是忽略、轻看、

²²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北京：商务，2015年），1卷4章24节，31页。

忘记上帝的律法，正如当初犹太人所犯的错谬一样：“**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 4:6）。

终极而言，那些不爱慕、考究、遵守上帝的约法的人，不管如何自以为已经得救，都不过是浑水摸鱼、自欺欺人、最终倒毙在旷野中的“闲杂人”，真正爱主的人应当与他们绝交，绝不可受他们的蛊惑（利 12:38；民 11:4；尼 13:3）。毫无疑问，这种对于圣约的强调乃是清教徒神学的精华，《威斯敏斯德信条》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把圣约上升到教会正式认信的地步。该信条在第七章论及“上帝与人所立的圣约”时明确界定：“上帝是人的创造者，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人本当顺服上帝。但是，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如此巨大，所以，人绝不能享有他，以此为自己的福分和赏赐，除非是上帝自愿俯就，这俯就乃是他乐意用立约的方式显明的。”上帝与人之间乃是圣约性的关系，亚当犯罪就在于违背上帝的圣约，从而把人置于罪恶和死亡的深渊里。耶稣基督的救赎则是集中体现在担任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代表并代替我们成全上帝的律法，这样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 8:4）。因此，敬畏上帝，遵守诫命，这是人最基本的责任，正如圣经本身所强调的：“**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 12:13-14）。莱特在分析后现代主义对于邪恶的分析时指出：“当人再也不承担责任时，道德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静观对其他美德不屑一顾，能够承担责任至少是人心的最后防线。假如连责任都不想承担，人心就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了。”²³ 更深刻的追问则是：假如我们连上帝的律法都不承认，我们又怎能界定人的责任呢？加尔文 1536 年著述《敬虔生活原理》，阐明基督徒基本要道，他在第一章中首先解释的就是《约法十章》，强调人人都当遵行的爱主爱人的诫命与道理。简言之，《约法十章》乃是我们通向上帝的道路，我们越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越是亲近上帝，越是合乎上帝的旨意，最终必然得蒙上帝的祝福；越是背离上帝的律法，就越是偏离上帝，违背上帝的

²³ 莱特，《邪恶与上帝新世界》，张悦慈译（台北：校园，2013 年），26 页。

旨意，最终必然受到上帝的咒诅（利 26；申 28）。对于基督徒的侍奉而言，一旦我们背离上帝的律法，就会沦陷在各种样式的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之中。因此，传讲和遵行上帝的律法乃是最基本的底线。所以，在《启示录》中反复强调基督徒圣徒必然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人：“**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启 12:17）；“**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 14:12）。

当我们谈及基督教信仰的“真理”的时候，最好的概括就是《使徒信经》为代表的“道统”。这一“道统”明确界定了我们信仰的终极对象和基本内容。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二十二问：“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回答：就是在福音里所应许我们的一切，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条《使徒信经》中各项条款所简略地教训我们的。”二十四问：“怎样划分这些条款呢？回答：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圣父上帝和我们的受造；第二部分论圣子上帝和我们的救赎；第三部分论圣灵上帝和我们的成圣。”因此，《使徒信经》所呈现的大公教会的信仰是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为中心的信仰，这种信仰也恰恰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太 28:20）。清教徒解经家马太·亨利解释说：“中保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国度，使列国都成为他的子民；建立了一个学校，使列国都成为他的学者；兴起了一个大军，与黑暗权势作战，把列国征召到他的旗帜之下”（Christ the Mediator is setting up a kingdom in the world, bring the nations to be his subjects; setting up a school, bring the nations to be his scholars; raising an army for the carrying on of the war against the powers of darkness, enlist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under his banner.）²⁴

《威斯敏斯德信条》在第七章论及“上帝与人所立的圣约”之后，第八章马上谈及“中保基督”，共有八条解释基督中保的职分，但没有一处提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毫无疑问，清教徒的信仰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以基督为中保”的信仰，目前很多教会中大肆渲染的“以基督为中心”并不合乎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两千年认信的

²⁴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Matthew 28.*

立场。事实上，《使徒信经》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绝不是“中心”！钟马田先生提醒我们说：“圣灵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子那里，因为他是奉差遣来荣耀子的。子的主要心愿则是荣耀父。现今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人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有一派流行的神学强调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从某方面讲，那是正确的；但我们绝对不可停留在子这方面。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因基督也曾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彼前 3:18）。²⁵ 因此，我们传福音要传得全备，最起码要合乎《使徒信经》所总结的内容和模式，强调圣父上帝的拣选、圣子上帝的救赎与圣灵上帝的落实和成全。不回到以《使徒信经》为代表的福音真理，不管我们怎样强调“以福音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都不过是传讲另外一个福音而已，保罗特别强调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 1:7-9）。因此，在“中国福音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牢记到底福音是什么，免得不知不觉被魔鬼欺骗，用生命领受和传讲的“福音”并不是真正的福音！

当我们谈及基督教信仰的“生命”时，我们强调以《国度祷文》（太 6:9-13）为代表的“国统”。这一祷文通常称为“主祷文”，其实按其精义而言应当名之为《国度祷文》，耶稣基督向门徒阐明他们最大的期盼和追求就是上帝的国度和公义。这一国度祷文的中心是祈愿上帝的国度降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日教会中盛行的是对撒但黑暗的国度的大肆渲染，教会已经丧失了在世界历史中不断得胜的信心和盼望！不管各种错谬的神学如何强解圣经，瓦解选民得胜的斗志，我们始终强调那些真正热爱上帝、信靠基督、遵行诫命的人必然不断在历史中得胜：

“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一 5:3-4）；**“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11:15）；**“他们与羔**

²⁵ 钟马田，《在基督里合一——以弗所书第四章 1-16》，钟越娜译（香港：美国活泉出版社，1999年），112页。

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 17:14）。“教会国度化”要求当像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那样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上帝的国度指向上帝的主权和统治。因此，我们不能在地理上把上帝的国度局限在天上，因为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我们不能在时间上把上帝的国度局限在只有人死之后才能进入，因为当我们真正归信上帝的时候，“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西 1:13）；我们不能在存在上置身于上帝的国度之外，因为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11:15）。因此，我们强调“教会国度化”就是教会当以追求上帝的国度为优先，教会传讲的信息当时国度的圣约、国度的律法、国度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后面解释的“三元传道”）。建制性教会应当传讲国度性的信息，承担福音使命，勇敢地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信息；有机性教会应当完成国度性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自觉在个人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发挥见证性和带领性的作用，用各样的恩赐和力量来配合教会的传道。基督徒应当自觉地接受训练，成为上帝的国度的精兵。

那些不明白上帝的国度，不愿意接受基督为上帝和罪人之间的独一中保，也不愿意考究和遵行上帝的约法的人，不管他们在教会和社会中处于什么高位，都不过是尼哥底姆式的人物，缺乏在基督里得享新生命的标记，求主怜悯他们，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确实能够得见和进入上帝的国度（约 3:1-21）。新生命的标记就是圣灵把上帝的国度的律法刻在圣徒的心版上，使得他们发自内心地通过遵行上帝的约法来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来 8:10）。我们强调圣灵在人心灵中的工作，把重生与上帝的约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基督教信仰重新回归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强调，重新把个人心灵的更新与遵守上帝的约法结合起来，使得雅和博经学从根本上把“主体性经历”

（subjective experience，“福音化”的核心就是个人心灵的变革）与“客观性真理”（objective truth，“基督化”的前提就是承认上帝的约法的客观性和不变

性)结合起来,达成最深最广的整合与圆融。这种整合乃是个人内在的心灵秩序的整合,这种圆融乃是世界历史中主客之间的圆融,也是内在生命与外在使命之间的和谐,这就是“教会国度化”的精义。

三、心灵三转与生命三变

“三化异象”最根本的落实就是生命的改变。世上那些攫取国家政权、残酷欺凌民众的人总是担心基督徒夺取政权;教会中潜伏的各种类型的奋锐党人和阴谋家总是想利用基督教来发动革命,建立各种形式的“太平天国”。针对教会内外各种形式的对于政治和权力的痴迷,雅和博经学明确强调圣经中所启示的乃是心灵之学。

我们强调个人两大秩序,首先是心灵与身体的关系,乃是由心灵统帅身体。人有灵魂和身体,但灵魂和身体并非处在截然二分的状态,而是人的灵魂寄居在身体之中,并且由灵魂统帅人的身体,使其成为上帝的殿堂,成为上帝使用的公义与慈爱的器皿。其次就是人的心灵有理性、情感和意志三大功用,在这内在的三大功用中,当由理性统帅情感,由情感统帅意志。我们的理性应当认识上帝、自我和个人的责任,我们的情感应当爱慕上帝、爱邻如己并且喜欢自己的责任,而我们的意志应当在行动的抉择上始终以荣耀上帝为人生的首要目的,以爱邻如己为行动的动机,以尽职尽责为生命的追求和落实。不管是在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上,还是在知情意三大功用的协调上,真正成熟和幸福的人就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完成自己的职责的人。那些没有使命感,不愿意履行自己的职分和责任的人,就会产生“品格紊乱”(character disorder)的问题。²⁶ 具有这种“品格紊乱症”的人的典型特征就是总是把责任推到他人和社会身上,总是以受害者和牺牲品的形象出现,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愿意面对自身的败坏。因此,我们所强调的生命的改变最终必然落实在爱主爱人的圣徒品格上。

²⁶ See M. Scott Peck, *The Road Less Traveled: A New Psychology of Lov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Spiritual Growt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此书强调“神经质者”(neurotics)的主要症状就是承担他们难于承担的责任,因此使得他们自己非常痛苦;而“品格紊乱者”则始终认为他们不是问题的本源,问题的本源在于别人、社会、世界、家庭等等,因此他们经常使得别人也非常痛苦, pp. 36-38.

从“道统”到“国统”，就是从教义神学到密契神学，这是一个真理与信仰内在化的“由外及内”的过程，这个内在化的过程的关键就是“由内到上”，也就是由内在的心灵默想到得蒙上帝施恩而进入静观之真正直接得见上帝的过程；从“国统”到“法统”，就是从密契神学到道德神学，这是一个心灵与经历外在化的过程，也就是由“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深刻的“天上的”的静观祈祷到“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样踏实的“地上的”的法治天下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就是圣经启示、奥古斯丁那个所强调的三大心灵转向，第一大转向是“由外及内”的内在化转向，就是通过意志的自由决断，使心灵从外物（物质环境与身体状况）决定论的羁绊中释放出来，回归自身，直面自己内在的生存状态。这种转向使得心灵从此具有了自身意识，过上了反省、默想、内观、悔改的内在生命之路。因此，保罗对于歌林多教会有很多教训、叮嘱和劝勉，但最终的落实是让我们转向自己的内心：“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林后 13:5）。这种转向乃是个人心灵深处的“第一次革命”，这种“革命”所要革除的就是消极被动的、外在物质、环境与身体的决定论。“中国福音化”强调的就是这种灵魂深处的革命！因此，我们强调“中国福音化”，并不是发动激进的街头政治或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恳切的祷告和生命的见证来传讲悔改的福音，使得更多的人甘心乐意地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为之忧伤痛悔，放弃对于社会的抱怨和他人的仇恨，转向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使自己受伤的心灵真正得到内在的医治，并且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负伤的治疗者”，不仅自己逐渐得蒙医治，也能够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带领别人经历医治。²⁷

第二大转向是超越性转向，就是心灵“由内至上”的神圣性、超越性转向，就是通过理性的默想、收心、宁静式祈祷而进入合一式的祈祷，在情感上得蒙上帝大爱的浇灌和转化，在意志上达到与上帝的旨意的完全的契合，从而摆脱我们自身知情意上的自法、自爱与自决三种精神决定论（理性主义、情感主义与唯意志论），回归上帝，领受上帝对于自己所赋予的天命天职。这种转向使得心灵从此明确了身份与使命

²⁷ 参考卢云，《附上的治疗者：三代牧养事工省思》，喻书琴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

意识，知道自己乃是上帝拣选、基督救赎、圣灵充满的人，品尝到上帝的恩典与慈爱的滋味，在上帝面前得享满足的喜乐。这种深刻地亲近上帝，超越了人头脑的知识，使人从常常心怀不平的小信转向心灵深处的确信，正如诗人所表达的那样：“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诗 73:25-28）。这种转向乃是个人心灵深处的“第二次革命”，这种革命所要革除的就是内在理性、情感与意志的决定论。²⁸ “教会国度化”首先强调的不是建制性教会的发展，虽然这种数量上发展、制度上的健全、外在性的宣教也非常重要，但“教会国度化”的核心不是外在化，而是内在化。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首先是通过祷告来祈求“愿你的国降临”，这种降临首先是发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祷告的牧师不是推动上帝做事，也不是督促上帝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亲近上帝，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上帝的大爱和光照中得到改变。因此，基督徒要安静下来，走入自己心灵的城堡，与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上帝相遇、现实、相知、相爱、相契。“教会国度化”首先就是基督徒个人心灵城堡的重整重建，而这种重整重建乃是以我们的心灵完全转向上帝为中心的。只有当我们这样转向上帝、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深度的光照和医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 16:11）。

第三大转向乃是外在性转向，就是心灵“由上至下”、“由内及外”的转向，就是从内在生命中的静观祈祷转向外在使命的承担和约法的领受，从而建立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圣约式家庭、教会与国家。这种外在性转向乃是雅和博所特别强调的。外在使命的承担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帝在世界中创造我们，并且把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赐给我们，人类的最终归宿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天堂，而是“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乃是参与他在世界历史中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宏观性蓝图就是：“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

²⁸ 参考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11卷；张荣，《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3页。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弗 1:8-10）。我们不仅强调使命的承担，同时还强调约法的领受。要参与上帝的计划，承担上帝赐给的使命，我们必须首先领受上帝的约法，并且立志遵守上帝的约法，正如上帝当初对于以色列人所教训的那样：“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 19:5-6）。因此，雅和博经学回归圣经，访问古道，追本溯源，拨乱反正，使得上帝的子民重新从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浮状态中首先通过静观祈祷达到“天上”，然后落实在“地上”承担使命，积极行善，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今生今世“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罗 5:17），“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这就是基督徒生命中当经历的“第三次革命”，这种革命直接革除的乃是各种异端邪说、错谬神学对于基督徒生命的辖制与损害，乃是通过己立立人、立法改制使更多的人能够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得享荣耀尊贵为冠冕。这种生命的转向就是“文化基督化”，其手段和途径不是通过暴力，更不是通过各种诡诈性的阴谋诡计，乃是通过个人生命的改变和忠心的奉献。我们要愿意为我们的家庭、教会和国家的重建流汗、流泪、流血。“流汗”就是我们自身辛勤的劳动，“流泪”就是我们自身迫切的祷告，“流血”就是甘愿为保家卫国、传扬真道献上自己的生命。正如英文中一句名言所说：“如果你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你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If you are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then you are part of the problem）。²⁹

在心灵三大转向中，内在性转向使人从各种形式的虚假的信心转向真实无妄的信心，使人在圣灵的光照下在心灵深处真正经历到救恩之乐，乃是人的生命从不信到信徒的转化。超越性转向使人真实的信心转化为心灵的确信，使人在心灵深处真正得见上帝，乃是基督徒生命从信徒到门徒的转化。外在性转向乃是真正敬畏、经历上帝的人转向治理全地、道化世界的文化使命，活出上帝造人本有的荣耀和尊贵，勇敢

²⁹ Quoted from M. Scott Peck, *The Road Less Traveled*, p. 39.

地承担自己的责任，积极地消除世上一切人欺压人的丑陋和凶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与和平的使徒。当然，这三种转向并非在时空上截然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互相之间有着一定的交叉的，基督徒的一生都会贯彻、交织着“由外及内”、“由下之上”、“由内及外”的转向和经历，但这三大转向和经历的逻辑性的方向则是从不信转向信徒，从信徒转向门徒，从门徒转向使徒，这也就是雅和博经学中反复强调的“生命三变”，并且我们把这种“生命三变”与“灵修三路”和“三化异象”直接联系在一起。“灵修三路”向我们指明的是以内在生命的操练为核心的灵修神学，而“三化异象”乃是以中国社会的该表为导向的公共神学，中间的桥梁就是“生命三变”。

对于基督徒而言，若是没有经历第一大和第二大心灵转向，就是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转向在内心世界中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就会很快转向外在的世界，把基督教视为改变世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救亡图存、建立共和的利器，忘记了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耶稣基督当初所竭力回避的就是这样的奋锐党人：“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 6:15）。主后一世纪的犹太教和耶路撒冷就毁于此类奋锐党人之手！³⁰ 洪秀全成立“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也属于这种奋锐党类型。³¹ 第一次心灵的转向使得我们真正认罪、悔改，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第二次心灵的转向使得我们真正领受上帝的大爱，经历内在生命的转化，使得我们心中的一切骄傲、苦毒、仇恨、嫉妒、纷争等灵魂的溃疡都得到根本性的医治，这样我们才能进行第三次心灵转向，就是从更新的自我真正地以谦卑和爱心转向世界和他人，成为上帝使用的劝人与上帝和好的和平使者，这就是保罗所凸显的信息，当然也是圣经启示的真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

³⁰ 参考保罗·梅尔，《约瑟夫著作精选》，王志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中《犹太战记》23章专论“耶路撒冷的奋锐党”，342-357页。

³¹ 参考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林后 5:17-21）。因此，真正的更新和变革首先是我们个人开始，就是从我们个人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恩开始。但是，个人的得救绝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只能是基督徒生活的起点，这种得救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重新归位，成为上帝的儿女和使者，在世界历史过程中找到我们的定位和责任。我们绝不是放弃对于这个世界的承担和参与，而是始终回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始终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才能够找到我们在世界和历史中的定位。

四、三化异象与中国未来

“中国福音化”，强调的是个体灵魂的出路；“教会国度化”，强调的是建制教会的出路；“文化基督化”，强调的是文化与社会的出路。赵天恩牧师所提出的“三化异象”从根本上为中国个体灵魂的救赎与安顿，为华人建制教会的定位和事工，为中国文化的突破与更新，提供了来自圣经启示和改革宗正传的出路。

赵牧师在谈及中国文化为什么需要基督化的时候强调，首先基督的门徒必须在思想和生活上更新变化，也就是我们自身的“文化基督化”。因此，基督徒首先不要固执己见，而是应当全方位地回归圣经，访问古道，使自己在思想和生活上得到彻底的更新变化，建立全方位的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没有基督徒这种个人性的更新变化，不管是“中国福音化”，还是“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都无从谈起。只有当我们自身通过自觉的学习和灵修而深度地经历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之恩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动地承担起“三化”的异象与使命。

要使“中国文化基督化”，必须从“中华民族福音化”上。赵牧师强调，基督徒的门徒负有与同胞奉献福音好处的责任，这当然是指向福音使命。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自然就会与中国文化中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产生相遇和冲突，我们自然就会运用我们已经具有的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提出先知性的针砭，并尝试改造各种比较落后、野蛮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女人由来已久的裹脚恶习，以及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皇权专制，这自然使得我们进入“文化基督

化”的领域。因此，“文化基督化”并不是基督徒刻意进行的文化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而是我们自身在生活和传福音过程中福杯满溢、自然而然进行的事。最大的暴君既不是残酷杀戮的希律王，也不是进行军事占领的罗马总督彼拉多，而是辖制我们的罪，因此保罗强调：“**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罗 3:9）。此处保罗强调的并不是“罪恶之中”，而是“罪恶之下”，Brendan Byrne 注释说：“‘罪’被看成是有权势的暴君，‘罪’为奴隶的主人，所有人类都被‘罪’这个暴君奴役着，都在这暴君的权势辖制之下。”³² 因此，文化基督化要打到的最大的暴君首先不是任何人，而是罪本身对于人类人性的辖制。这种辖制破坏的是心灵秩序，然后直接影响的就是社会秩序，当然最终也必然会对自然秩序造成破坏。

“中国文化基督化”的核心就是“在救赎性启示的光照下，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³³ 在时代变幻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赋予经典新的解释，而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这是每一代新的思想家都当承担的使命。中国自清末就已经感受到的“大变局”、“大转型”绝不是继续重复几千年来古已有之的改朝换代，而是从根本上摆脱中国几千年来盛行的偶像崇拜和皇权专制的陋习，转向圣经中所启示的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特色的基督教文明。毫无疑问，主流的中国学者都深信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也就是学习以英美基督教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绝不是拉丁美洲式的天主教模式，绝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模式，绝不是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模式。

但是，我们绝不能幼稚地要把中国文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走全盘西化的模式。实际上，即使在本质和原则上走全盘西化的路子，正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我们也不必丢弃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而是应当充分甄别、真理、使用这些优秀的成分，使其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对接点，这样才能完成中国文化本身的“基督化”。任何本土性的创造都是在充分立足本土文化的前提下，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才能达成创

³² Brendan Byrne, 《罗马书诠释》，活水编译小组（台北：光启，2012年），60页。

³³ 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23页。

造性的转化。我们需要的是在本土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改良（improvement），而不是讲坛信息和传统文化的撕裂与革命。

五、三化异象与三元传道

笔者把这种“同归于一”的世界大同的异象与赵天恩牧师所强调的“三化异象使命”联系在一起。“三化异象使命”乃是他从上帝领受的使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落地生根的战略蓝图：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与文化基督化。赵牧师远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首要的就是推动福音事工，传福音使多人信主，就是量的增加。第二是要建立国度化的教会，就是按照神的救赎启示使教会更新，不受宗派主义或某些文化的捆绑，而进入神的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第三、文化基督化，就是鼓励教会、信徒去影响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使国人得到福音的好处，甚至改造原有的世俗文化及社会制度。基督徒参政及从事教育工作都是更新社会的好途径。”

赵牧师在“三化异象”中突出强调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平衡，强调“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与“文化基督化”三大工作应当同步进行，不可偏废，但其中的核心就是教会的更新，也就是教会的国度化。只有当教会真正国度化的时候，才能传讲国度的福音，教导国度的律法，才能在国度的框架内达成律法与福音的真正平衡，使得上帝的子民不仅领受上帝赦罪的福音，也会领受上帝赐下的治理全地的诫命与使命，真正成为上帝的国度中的将才。基本的过程就是：“福音传出之后，新的信徒会自动建立教会制度，跟着教会的更新（国度化），教会就会影响文化与社会，文化基督化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传福音的责任。所以，传福音使教会复兴，而教会复兴又会展开差传事工。”目前欧洲和中国教会的问题就在于：“欧洲及中国福音派教会在非基督教压力下却退缩到福音化的小圈子里，只向个人传福音，而忽略了文化使命的重任，导致文化世俗化的结果。”³⁴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目前世界大部分教会存在的问题就是偏重福音使命，忽略甚至否定、忘记文化使命，使得基督教成为反文化、反知识、反律法的玄学密教！我们强调“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导向就是

³⁴ 赵天恩，《扶我前行》（台北：中国福音会，1993年），31-32页。

“文化基督化”。“中国福音化”使得我们成为上帝的国度的子民和使者，“教会国度化”使得我们接受国度的教育和装备，而“文化基督化”则是我们真正到位，作为上帝膏立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真正领受并完成治理全地的使命和托付。因此，对于中国社会与文件化的转型而言，没有“福音化”，我们就是死路一条，只能继续生活在与上帝隔绝、彼此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之中；没有国度化，哪怕是上帝的子民，也是一盘散沙，缺乏国度性群体的意识，当然也缺乏国度性使命的觉悟，只能停留在“信耶稣，升天堂”的幻觉之中，不能把福音信仰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成为自觉的世界历史的参与者和谱写者。“文化国度化”使得我们重新回到上帝当初创造人就赐给人的授权和使命，这种授权和使命也使得人以**“荣耀尊贵为冠冕”**（诗8:5）。认为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就能够实现“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与“文化基督化”，这乃是“神经质者”的症状；不愿意承担起这样的异象和使命来，总是指责他人和社会的黑暗与过错，乃是“品格紊乱者”的症状！求主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和背道的疾病，使得我们完全仰望上帝的大爱和大能，同时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来。

要在国度的框架内把上帝启示的律法与福音之道传得全备，我们总结出了“三元传道”的模式，并且把这一模式与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结合起来。赵牧师在其“三化异象”中只是原则性的提及教会当如何行动，至于上帝的国度、福音、律法到底是什么，他并没有做出详细的界定。尤其是他所爱的改革宗神学，更是因为照顾大多数中国大陆教会反宗派的情绪，没有旗帜鲜明地宣讲改革宗神学。雅和博经学体会赵天恩牧师的情怀，明确地反对唯我独尊的宗派主义，谦卑地传讲改革宗神学，并且在传讲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强调回归圣经，访问古道，造就教会。因此，我们所强调“三元传道”乃是根据圣经启示和改革宗正传把上帝的国度、福音与律法具体地呈现出来。对于上帝的国度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国度祷文》，这一祷文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国度的核心内容以及我们对其当有的追求。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圣经与圣约乃是上帝与我们设立的国度的宪章，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就是国度性的呼召，这呼召集中体现在圣约的应许上：**“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上**

帝，你们要作我的子民”（利 26:12）。基督徒的教牧侍奉必须有国度的异象和追求。其次，我们要传讲以《使徒信经》为标记的福音（道统），以《约法十章》为标记的律法（法统）。在以上三大统绪中，我们从“道统”所强调的“三一世界”（圣父上帝与世界的创造、圣子上帝与世界的救赎、圣灵上帝与世界的成全），到“国统”所强调的“三国进程”（上帝荣耀的国度、恩典的国度和撒但的国度），然后到《约法十章》所强调的是“三律合一”（道德律、民刑律、礼仪律），从而得出“三元传道”的主张，强调要把圣经真理传的全备，必须在国度的框架下传讲上帝赐下的约法与福音之间整全、平衡与和谐之道。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强调的“道路、真理与生命”的核心内容。特别是此处强调的传讲上帝的律法，乃是教会真正归正和复兴的唯一道路。西方教会内外的左派人士仇视西方基督教文明，他们能逐行“宽容”、“包容”、“反歧视”、“不做批判”，甚至“收入平等”，所以他们都痛恨一切标准，因为有标准就有判断，而左派是不喜欢被人判断的，虽然他们总是判断别人。³⁵ 消除左派影响的良方就是传讲上帝的律法，这也是欧美文化保守主义首先强调的。当然，我们宣讲上帝的律法，不仅仅是强调上帝所启示的是非分明的原则和立场，更要带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大爱和饶恕之心，因为正如耶稣基督所强调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 9:56）。上帝本身也不是究察罪孽、铁面无情的上帝：“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 130:3-4）。

要达成“教会国度化”，首先需要的是教会的神学和建制，而是真正重生得救和分别为圣的基督圣徒。没有重生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得见和进入上帝的国度（约 3:1-8）；没有个人性的分别为圣的灵修操练，我们所谓的传道和见证都不过是假冒为善。要真正实现“中国福音化”，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白到底福音是什么，免得我们虽然在传福音，却是在传“别的福音”，就落在保罗所说的可诅可咒的范围之内（加 1:6-9）。要真正实现“文化基督化”，基督徒就需要建立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和文明论，这样我们才能把人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能夺回，使其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和教训

³⁵ See Dennis Prager, *Still the Best Hope: Why the World Needs American Values to Triumph* (Broadside Books, 2013).

之下（林后 10:5）。弘扬这种“三元传道”的模式，分享“三化异象使命”，装备基督徒自觉地进行文化宣教，参与上帝所启示的“同归于一”这一世界大同的蓝图和计划，也是雅和博经学的主导性异象与使命。

六、三源合流与三化异象

“三源合流”为“三化异象”之实现提供了宏观性、综合性的蓝图。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在 2014 年 2 月温哥华举行的理事会上正式决定接受“三源合流”作为事工的核心理念。2015 年正式通过《洛斯·阿拉莫斯“三源合流”宣信》，明确界定了圣经、圣灵与圣徒这种“三源合流”在基督教真理与生命圣传中的内涵、地位和作用。³⁶

“三源合流”的主张，乃是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从多年的祷告、探讨和践行中得出来的结论，是众多华人牧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祝健牧师、李顿牧师、张伯笠牧师、邱林牧师、李晖弟兄、郭昶弟兄、徐志秋牧师、周小安牧师、王伟成教授等多位牧长，在多种场合都有文章和演讲予以阐述，因此三源合流这一主张本身的形成就是华人教会主内连接、集思广益的美好见证。正如宣言一开始就告白的那样，笔者深信：

“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面对华人教会与社会的转型，我们深信‘三源合流’乃是教会追求合一与复兴当走的道路。”

“圣经、圣灵与圣徒”三者合一 是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所强调的“三源合流”的 精义。这种合一不是三大群体和传统在外在的组织形式上的统一，而是彼此之间在内在生命与国度事工中的连接。第一大群体与传统是强调圣经和神学的传统群体，第二大群体与传统是强调圣灵和恩赐的传统群体，第三大群体与传统是强调圣徒和生命的传统群体。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简化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基督教群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圣经、圣灵和圣徒的功用，但相比而言，不同的群体确实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些群体与传统各有利弊，甚至各有自己潜在的危险性，比如改革宗重视圣经和神学，这本来是好的，但危险就是变成冷冰冰的“以理杀人”的人，自以为教义纯正，随意否定其他群体和传统的合法性，非要把别人都“归正”不可；灵恩派重视圣灵的恩赐和个人的体验，

³⁶ 本部分参考笔者著《圣经圣灵与圣徒——三源合流与雅和博经学的精华》（美国：润邦，2016年），上册，89-98页。

这本来是好的，但危险就是滥用圣灵之名，不受任何真理体系的约束，搞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来，非要教导别人学习“说方言”；聚会处注重内在生命的操练，强调教会的权柄和属灵的传承，这本来也是好的，但危险就是忽视教会正传和社会责任，走入自我感觉良好这种神秘主义的泥潭，以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取代圣徒在这个世界中的使命和责任。更可怕的是，这三大群体与传统之间语言和角度各不相同，很难沟通，彼此之间仿佛鸡同鸭讲，很难互相造就。

三源合流的目的就是化解目前教会中这种不同群体和传统之间彼此隔绝的困局，为彼此之间的爱心交流提供新的框架和出路。因此，在本质上，三源合流是一种教会合一的运动。教会的合一在本质上就是这三大群体在耶稣基督里由圣灵内住所达成的内在生命的合一，当然也必体现于在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之下国度事工的合一上。美国本身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立约式的共和国，同时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牧者和信徒本身也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不同文化和宗派背景的群体。“三源合流”不仅为北美华人教会和牧者这一比较复杂的群体提供了简捷的学习、对话与合作的平台，也为普世华人教会在神学和事工上的合一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是医治导致华人教会四分五裂的宗派主义之病的良药。“三源合流”的关键不是“三源”，而是“合流”，重点在于不同群体和传统之间的沟通与成全。在这种“合流”中，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教会内部不同群体和传统存在的现实性；其次就是要承认自己所在的群体和传统并不是完全的，仍然向其他群体和传统学习的必要性；第三，要以谦卑和开放之心自觉地向其他群体和传统学习、借鉴其优胜之处，从而使自身在客观真理、主观体验与社会见证上更加整全有力；第四，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上帝要有敬畏之心，对于其他群体和传统的弟兄姊妹要有真正的关爱、成全之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可一言不合，就反目成仇，更不可随意给对方贴上“极端”、“异端”的标签。

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我们强调“中国福音化”。“中国福音化”就是推动福音事工，使更多的人认罪信主。此处强调“传福音”，但“传福音”的重点不仅仅在于“传”，更在于“传”的确实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正如保罗所言：“但无论

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 1:8-9）。因此，传福音必须注重合乎圣经中所启示的纯正的教义，否则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有可能成为“成功福音”、“廉价恩典”等等，不注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不强调认罪与悔改的信息，不愿意传讲和顺服上帝的律法，最后带出来的人都是“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的民间宗教信徒，绝不是愿意为见证圣经真理而舍命的基督门徒。因此，中国福音化与圣经启示和纯正教义直接相关，这与教理派的强调有关，中国福音化必须高举圣经真理，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真理为代价。而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舆论乃是试图以无神论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来毒害基督教真理的一种图谋，针对这种图谋，我们更要强调“中国福音化”。

从圣灵充满的角度，我们强调“教会国度化”。“教会国度化”就是建立国度化的教会，按照上帝的救赎启示更新教会，使教会不受宗派主义、各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我们强调教会不应接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毒害与辖制，而是要强调教会的圣而公的国度特性，强调圣灵做工使我们分别为圣，必然使我们摆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各式各样的无神论、敌基督的“幽灵”的捆绑，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工作，“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西 1:13）。因此，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要追求和热爱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是上帝的国度和公义（太 6:33）。我们固然愿意我们所在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但绝不会以背叛上帝、牺牲真理、戕害良心为代价。真正的圣灵充满必然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 1:7）。因此，教会国度化注重的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这种国度化的教会生活排除、抵制三大干扰：一是来自世俗国家无神论政权的逼迫、收买与辖制，二是教会内部宗派主义的倾向，三是基督徒逃避公共参与、将信仰私有化的倾向。³⁷当然，教会国度化也直接关涉到基督徒内在生命的建造，因为上帝的恩典的国度首先是从我们心中展开的，真正的社会与文化的变革要从个人心灵

³⁷ 参考王志勇“基督教的公共性和私有化”，《公义与慈爱相亲——写给华人教会的公共神学》（台北：橄榄，2014年），页 29-42。

的深处开始。正如洛威廉所强调的那样：“基督在世上建立这不属世界的国是怎样的呢？这个国，就是他在人心里作王，因为他在复活、升天后，便藉着他的灵与人同在，并住在人里面。”³⁸ 没有这种上帝的国度的内在化，我们一切外在的国度的开展都缺乏内在的根基。许多基督徒之所以沉溺在神学和宗派的争论中，自身缺乏得救的确信和生命的见证，就是因为内心没有上帝的圣灵和国度。因此，“教会国度化”与敬虔派的强调有关，上帝的国度要从我们的心灵开始。

从圣徒相通的角度，我们强调“文化基督化”。“文化基督化”就是强调完成上帝赐给基督徒的治理全地的使命，“鼓励教会、信徒去影响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使国人得到福音的好处，甚至改造原有的世俗文化及社会制度。基督徒参政及从事教育工作都是更新社会的好途径。”³⁹ 赵天恩牧师进一步概括说：“中国文化基督化就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影响中国文化，成全中国文化，在文化界占领导位置，成为主流思想。”⁴⁰

“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⁴¹ 文化基督化的核心就是基督徒以圣经真理全方位地更新、成全中国文化，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明出路。正如余杰弟兄所分析的那样，“今天，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论争，不是政治层面的分歧，乃是属灵的斗争。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正因为‘被基督信仰光照的自由主义’（或者用赵天恩牧师的话来说‘基督化的文化’）不在场，才使得共产主义大获全胜，中国陷入亘古未有的专制暴政的深渊。”⁴² 雅和博经学将赵天恩牧师所提出的“文化基督化”进一步深化，明确地强调建立“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基督教文明的理念。正如唐崇荣博士所分析得那样：“文化和文明是不同意义的——文化是为文明预备的，而文化的巅峰就产生了某一个文明，文明的更就在文化的里面。”⁴³ 因此，“文化基督化”强调

³⁸ 洛威廉，《靠圣灵行事》，页 73。

³⁹ 赵天恩，《扶我前行》（台北：中国福音会，1993 年），页 31-32。

⁴⁰ 赵天恩，《扶我前行》，页 184。

⁴¹ 赵天恩，《扶我前行》，页 9。

⁴² 余杰，《我听见斧头开花——信仰、艺文与生活》（台北：橄欖，2013 年），页 90。

⁴³ 唐崇荣，《堕落与文化》（香港：STEMI LID，2010 年），页 37。

基督圣徒对于世界和文化的责任，与文化派的强调有关。“文化基督化”乃是“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的落实。合乎圣经的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必然给中国文化带来深度的转化性的影响，真正的神学必然影响到社会中的思想，发挥出更新文化的大能。

总之，“中国福音化”注重圣经启示、纯正教义和福音使命，与三源合流中对圣经的强调吻合，侧重圣经所启示的纯正的教义；“教会国度化”强调圣灵之工必然感动、带领教会追求上帝的国度，与三源合流中对圣灵的强调吻合，侧重基督徒个人性的经历和追求；“文化基督化”强调圣徒在世界上、历史中的文化使命和管家责任，与三源合流中对圣徒的强调吻合，侧重在圣经和圣灵双重装备下的圣徒在社会与文化中当有的使命和职分。⁴⁴

五、文化宣教与三大合一

在“三化异象”上，陈宗清牧师把“三化异象”浓缩为“文化宣教”四个字，强调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之间的互补性和成全性。⁴⁵更重要的是，陈宗清牧师与刘良淑师母以其生命为典范，以道成肉身的样式来关爱恩福宣教使团的各位神学生和牧者，特别是对我们夫妻的关爱，可谓是我们亦师亦友的主内亲人。经过和陈牧师夫妻的多次恳谈，我的内心多有亮光，特别是在本书的架构和内容上，得蒙上帝的光照，我把原来的“三大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与同归于一）更紧密地与“三化异象”结合在一起，更多地强调基督徒个人内在生命的圣化。“中国福音化”的关键在于“天人合一”，就是通过福音的传讲，使人真正经历在基督里与上帝的和好，这是“三化异象”的根基与核心；“教会国度化”的关键就是“知行合一”，就是通过律法的传讲，使人真正把信德与善行结合起来，这是“三化异象”的关键和枢纽；“文化基督化”的关键是“同归于一”，就是通过世界观的更新，使人真正从合乎圣经的

⁴⁴ 在唐崇荣牧师布道团于2016年6月8-1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基督教信仰研讨大会上，我谈及改革宗与基督教内部教理派、敬虔派和文化派三大倾向，加拿大温哥华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博士在会后与陈佐人牧师、陈彪牧师和我的交流中把这三大倾向与“三化异象”联系起来，强调“中国福音化”必须注重教理派所注重的纯正的教义，“教会国度化”必须注重敬虔派所追求的以上帝的国度为导向的敬虔的生活，而“文化基督化”所强调的就是文化派所强调的文化使命。洪予健牧师这种连接进一步界定和丰富了“三化异象”的具体内涵。

⁴⁵ 参考陈宗清牧师，《文化宣教面面观》（新北市：恩福文化宣教使团，2014年）。

世界观出发，建立敬天爱人的基督教文明，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荣耀上帝，见证基督。“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10）。这种“同归于一”既是圣经启示的上帝对于世界历史的计划和旨意，当然也是“三化异象”的导向和终极。

这样以来，我们解决了两大问题。首先，解决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对接的问题。对于中国文化，我们采取的是“谦卑性学习，尊重性理解，平等性对话，创造性转化，爱心性成全”的路径。因此，我们承认“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卓越之处，这是中国历代古圣先贤所崇尚的道德与人格理想。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内在困境，比如在“天人合一”方面缺乏对于位格性的上帝的认识，在“知行合一”方面缺乏来自上帝的绝对性、超验性、普世性的标准。这种“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所导向的“内圣外王”更是“内圣”开不出“外王”，就是即使个人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了“内圣”的程度，也没有解决国家最高权力和平过渡的问题！其实，儒家所提倡的“内圣”本身也缺乏终极性的标准、超越性的动力，最后难免走向假冒为善，自欺欺人，既不能开出“内圣”，也不能开出“外王”。⁴⁶ 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的就是基督教特殊启示的补足和成全。

在“三化异象”的达成中，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教会的地位和职分。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承认教会的重要性。在《使徒信经》中明确告白：“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首先，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之前先有“我信圣灵”：唯独圣灵能够使人出死入生，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并且甘心乐意地顺服上帝的律法。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圣灵的位格和工作，不可在教会传道和治理过程中利用任何人为的方法来勾引人信主，操纵人跟随，强迫人顺服。“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此处所认信的“并不是改革宗长老会”！“圣而公之教会”是指上帝从永世中拣选、在历史中救赎、在现实中保守的子民，不是指向任何宗派性、建制性的教会。实际上，世上任何有形的宗派性、建制性教会不仅自身是有限有罪的，并且随时有可能彻底败坏，甚至成为《启示录》中所说的“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

⁴⁶ 参考陈宗清牧师，《宇宙本体探究：基督教与新儒家的比较》（台北：校园，2005年）。

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启 18:3）。因此，耶稣基督没有宣告希律王朝的终结，没有宣告罗马帝国的崩溃，反倒强调当时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以色列教会的灭亡：“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太 24:2）。因此，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没有把“大使命”交给当时颇有建制的以色列教会，而是明确交给了从已经败坏的以色列教会中分别出来的使徒们。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宣告“我信教会”，甚至不加分别地强调“教会就是历史的目的”，而是要明确地强调真正有圣灵充满和圣徒相通的“圣而公之教会”。走向“密教”和民间宗教化，牧师成为教主，使人顶礼膜拜，不敢质疑，乃是基督教来华一千多年最常出现、最为丑陋的病症。⁴⁷ 这种病症绝不是来自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更不是来自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教会，而是来自中国几千年以偶像崇拜和皇权专制为特征的酱缸文化，在这种酱缸文化的熏染下，我们的人心人性之扭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我们归信上帝之后，这种洁净和更新的过程也是极其漫长的。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信主，因为建立了教会，就把自己和教会所在地说成是当代的“耶路撒冷”和“日内瓦”。不能因为社会上的人高喊中国“大国崛起”，就在教会中高喊“中国教会崛起”；社会上的人宣传“中国梦”，就在教会中推动“中国教会梦”，宣传中国教会必然“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把福音传遍世界、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最后一棒”。毫无疑问，这种拉大旗做虎皮、自吹自擂的做法也是来自中国酱缸文化的毒害！⁴⁸

除了区分“圣而公之教会”所说的“无形教会”与“有形教会”的不同之外，还必须区分“建制性教会”（the church as institution）和“有机性教会”（the church as organism）之间的不同。建制性教会是指世上按照一定的神学体系和治理框架组成的教会，而有机性教会则是指向上帝的子民。前者作为公共机构当专心以祈祷、传道、牧灵为念，后者则可以根据上帝对于每个人的呼召而从事不同的工作，包

⁴⁷ 参考连歆，《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何开松、雷阿勇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

⁴⁸ 参考余杰，《谁为中国理旧疆？》（台北：基文，2010年）；《刀尖上的中国：透视中国的五十道窗》（台北：主流，2015年）；《卑贱的中国人》（台北：主流，2017年）。特别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不是丑陋，而是甘为奴、彼此相残的卑贱。

括经商和从政。⁴⁹ 这已经是普遍性的共识，笔者在加尔文神学院的伦理学教授范瑞肯（Calvin P. Van Reken）明确指出：“教会作为公共机构的主要工作——不是伸张正义，而是教人们警醒，知晓神的审判；不是呼吁社会公正，而是向人们传达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公义；不是教人们如何选举政府官员，而是告诉万国万族人民，有一位神拣选我们进入永生。教会作为公共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开启神国大门，通过教导纯正的福音、执行圣礼和实践门徒的准则，来牧养纯正的基督信仰。”⁵⁰ 当初耶稣基督在以色列面对希律王的专制统治、彼拉多的军事占领，但他仍然专心传讲悔改与和解之道，甚至明确地劝说那些奋锐党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太 5:39）。同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耶稣斥责当时的教会和圣殿成了“贼窝”（太 21:13），应当完全拆毁（太 24:2）。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教会领袖大祭司和法利赛人无耻地联合希律王和罗马总督彼拉多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所遇到的迫害、甚至最后被钉死并不是来自希律王和彼拉多，彼拉多甚至在最后关头还想释放耶稣，认为他是无罪的。但是，“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太 27:20）。最可怕的就是罪人利用宗教挑动众人闹事，耶稣基督本人就是这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因此，有形教会或作为公共机构的教会应当持守自己的本位，忠于自己的职分，而上帝会使用基督徒个人、家庭、学校、国家等不同的管道和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因此，著名的改革宗长老制信仰规范《威斯敏斯德信条》不仅规定了教会的地位和职分，也规定了基督徒个人良心的自由、婚姻的界定和公民政府的职责。⁵¹ 我们不可把教会视为历史的唯一中心，把牧师视为上帝的唯一代表，只有上帝是历史的中心，世上任何个人及其组成的机构都有其自身的有限性和有罪性，都不配得人的绝对顺服，都当不断地通过悔改和更新而走向完全。不管是牧师个人，还是长老制的区会、总会都当谦卑地接受众人的监督和质询。尤其是在教义、人事和财务问题上，更应当保持公开性和透明性，不能像极权社会中各种形式的秘密会社那样搞暗箱操作。

⁴⁹ 参考 Herman Bavink, *Reformed Dogmatics: Holy Spirit, Church, and New Cre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2008), pp. 273-388.

⁵⁰ 范瑞肯，“教会在社会公义中扮演的角色”，2015年10月15日，橡树文字工作室。

⁵¹ 参考王志勇，《清教徒之约——威斯敏斯德准则》（上海：三联，2012年），55-115页。

除非是在涉及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等特殊性问题，大家达成共识，可以保密，其他一概不可隐藏保密，更不可动辄追究他人泄密之责，仿佛教会中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深知深信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不是若干人结党营私、占山为王的秘密会社！对外激进地争取自由，对内残酷地打压异己，这种假冒为善更是耶稣基督所特别斥责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太 23:27-28）。

基督教内部基要主义的问题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有机性教会在文化使命方面的负担，而自由派和现代派的问题则是淡化建制性教会对于福音使命的承担，也就是祈祷、传道和牧灵的重要性，片面地强调文化使命的重要性。教会内的野心家和伪牧师则是利用牧职和建制性教会去从事“民运”、“维权”等文化使命的的托付，从而利用牧职，以教会的名义为自己的私欲背书，有“绑架教会”之嫌。这种做法使得教会成为社会上各样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利用的工具，不仅使得建制性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不仅得不到充分的牧养和保护，反倒连信徒的小孩子都被带到公共广场上，成为世上政治权力斗争和博弈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另外，因为牧师带领会众走向公共广场，走向与国家和政府对立的地步，难免会授人以口，使得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教会成为重点打击甚至镇压的对象。最近网上盛传的一份调查表，问及“附近是否有异端邪教？”，后面的选项就是“中国改革宗/大地教会/极端灵恩派/新天地/马可楼/三赎派”。令人震惊的就是：全世界教会内外公认的改革宗正统神学，到了“中国”，已经开始被列为头号的“异端邪教”！当然，我们首先要指责的是无神论政府的故意打压。但是，我们不得不警醒的就是改革宗教会内部那些极端分子的喧嚣，他们鼓动信徒“殉道”，认为自己和教会已经构成了对我们所在的国家的政治挑战。此类说法并不是教会牧者传道必须传讲的信息，反倒把教会不断地置于国家对立面和挑战者的地位。这是需要我们警醒和分辨的。

八、基督徒的教牧侍奉

要实现“三化异象”，基督徒和教会自身的建设乃是不容忽视的基本。赵天恩牧师在分析中国大陆教会发展的进程和阶段的时候强调：“1996年到2002年间，是中国教会的转型期，在牧养方面遇到困境。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城市化及世俗化挑战，无论是家庭教会或三自教会都经历教会形态和事工的转变，多数家庭教会正在从拓荒布道转入牧养教导的重点，从动态的教会建造到静态的教牧关怀，特别是信仰的建造和属灵生命的建造。”⁵² 随着中国大陆教会从拓荒布道转入牧养教导，教牧侍奉成为基督徒个人生命成长和基督教教会集体见证的关键。

基督蒙召为圣徒，这种呼召就是两大方面，一是个人的分别为圣，二是致力于牧养关怀，就是作为上帝的管家来牧养关怀上帝赐给我们的家庭、教会与社会的各个领域。赵天恩牧师在谈及中国文化基督化的时候特别强调：“‘基督徒’是一群蒙基督救赎并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上与他联合的人；我们被呼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呼召对中国基督徒有何意义？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变化更新呢？在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中，凡与神救赎之目的冲突、不一致之处，正是我们更新变化的起点。这不单是一条个人成圣的道路，也是牧养关怀的途径。”⁵³ 在本书中，我们所强调的基督徒的教牧侍奉有狭义和广义两分。狭义的是指基督徒在教会中担任全职牧师的侍奉，广义的是指每个基督徒都因着圣灵的恩膏而与基督的受膏有份，都在这个世界上担任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

怀特菲尔德强调：敬虔的牧者乃是上帝赐给一个民族和国家特别的祝福。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大变局和大转型时期。可惜，中国社会转型的巨轮始终不能驶出长江三峡，而是始终在这峡谷之中碰碰撞撞、修修补补，甚至折戟沉沙。突破点就是教会的转型，因为教会乃是上帝重用的器皿，掌管天国的钥匙，传讲天国的真理。一旦教会能够真正转型到位，发挥“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的功用（太 5:13-15），就能为中国社会培养出真正转型所需要的天国人才，就是孟子所说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种

⁵² 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70页。

⁵³ 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23页。

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品格。⁵⁴ 没有这样的品格，再好的制度也都会被闲置，甚至会被滥用。基督徒的教牧侍奉，特别是全职牧者在教会中的侍奉，就是要致力于培养这样的圣徒加英雄式的圣雄人物，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在关键是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圣经中强调：“**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要培养出这样的天国人才、基督精兵，我们今日的神学教育与教会牧养模式需要彻底的更新。

作为上帝恩膏的先知，我们必须首先用我们的理性来侍奉上帝，这就是我们在雅和博经学中所强调的“理性修”，就是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上帝、自身和世界，特别是要认识上帝的律法。作为上帝所恩膏的祭司，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情感来侍奉上帝，这就是我们在雅和博经学中所强调的“情感修”，就是充分地运用我们的情感来爱慕上帝及其真理，特别是要爱慕上帝的律法；作为上帝所恩膏的君王，我们必须充分地运用我们的意志来侍奉上帝，这就是雅和博经学所强调的“意志修”，就是充分地运用我们的意志来顺服上帝及其吩咐，特别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三者合在一起就是基督徒当有的全人的侍奉，这种全人的侍奉体现在整全的神学体系、世界观和文明论上。因此，基督徒的侍奉绝不是东鳞西爪、支离破碎甚至自我矛盾、相互吞咬的侍奉，而是在真理中一以贯之、前赴后继、川流不息的侍奉。这种侍奉的精义就是雅和博经学所强调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的总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 22:37-39）。

因此，基督徒的教牧侍奉不仅指向神学神和全职的牧者，也包括所有基督徒。正如保罗所劝告的那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1-2）。目前大部分教会中，只有牧师在侍奉，最多是长老执事参与侍奉，大部分基督徒缺乏侍奉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侍奉，本书致力于全面、深入地解决这样的问

⁵⁴ 《孟子·滕文公下》。

题的。当然，本书所提供的不是侍奉的方法和技巧，而是探讨基督徒侍奉的真理和原则，强调基督徒当如何通过自身生命的更新与成圣而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正如邦兹在《祈祷出来的能力》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今天的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更多与更好的机械式的新组织与新方法，而是圣灵所能使用的人——在祈祷上有能力的人。”

⁵⁵ 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好的神学和制度，更是需要把好的神学和制度活出来的圣徒！这样的圣徒必须有亲近上帝、攻克己身的密契与克修的操练和经历。

在基督徒的教牧侍奉中，我们当以“三化异象”为基督教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以“文化宣教”所强调的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结合为基督教会侍奉的基本导向，以“三源合流”所强调的圣经启示、圣灵充满与圣徒相通的教会合一与国度连接为基本策略。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真正的圣洁和复兴。针对当今教会内部的荒凉，麦金太尔在其《追寻美德》结尾处展望说：“现阶段最要紧的，是要去建构各种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使得文明、理智与道德的生活能够在已经来临的新黑暗时代中持存。而且，既然美德传统能够在从前的黑暗时代的恐怖中幸存下来，那么，我们应该有理由怀抱希望。然而，这一次，野蛮人不是远在边界上伺机进犯；他们已经统治我们了很长时间。而我们对这一点缺乏意识，恰恰是我们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我们正在等待的，不是戈多，而是肯定属于不同寻常的人，那就是另一个圣本笃。”⁵⁶ 因此，笔者强调的首先不是改革宗神学，也不是长老制制度，更不是雅和博经学，这些神学和制度都不过是符号和器皿，最终目的都在于帮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好使我们能够生命改变，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深度的生命相交和喜乐（约一 1:1-4）。正如是约翰所强调的那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 20:31）。

⁵⁵ 邦兹，《祈祷出来的能力》，藤近辉译（香港：宣道，1997年）。

⁵⁶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third edi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 263. 中文译文出自李晋，“徐志跃：等待另一个圣本笃”，<https://www.jianshu.com/p/e8de3cb30f27>，2018年6月19日查考。

问答交流

祝健弟兄：志勇牧师自从加入我们的华牧，开始宣讲三源合流，他是讲得最多的，比我还讲得多，请问你在各地的分享，不论是私底下还是专门的演讲，你感受到大家对三源合流的反应是如何？他们是不是感到需要？是不是服务到了各地教会的一个需要？

王志勇弟兄：我想祝牧师问的问题就是三源合流这样的异象是不是真正服事到了中国教会的需要？我想中国教会的需要和问题，一个就是四分五裂，所以分堂不是植堂，而是分裂，分裂是教会植堂的重要方式，这是很可怜的。另外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教会不管你喜不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肯定会走上宗派化时代。当你深刻的思考信仰的时候，我们在学术上就会讲，学有学派，宗有宗派，无宗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分裂，同时又在分裂当中不断的成为宗派，怎么样能够既避免分裂，在尊重宗派的同时，保持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我想，三源合流的这个异象，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整全的图画，为什么呢？当一个宗派化的教会，它只有部分性的真理，一时之间是不能合一的，但是当遇到合乎圣经的、合乎教会的大江大河的时候，每一条小河、每一滴水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就简单回答到这里。

张义南弟兄：谢谢王牧师今天的讲道非常感人，有圣灵的充满，感谢神。马太亨利，他是一个清教徒解经家，他在解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 节，就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时，说这个大使命的核心精髓就是要使全地各个国家都建成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这个清教徒他的这个解经传统没有被欧洲或者欧美国家广泛的认可，为什么这些国家又政教分离、多元化、世俗化，那是不是背离了马太亨利这个解经家的初衷呢？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更详细的论述一下？

王志勇弟兄：张牧师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过去呢，我们提大使命，就是确确实实委身耶稣基督，委身耶稣基督的使命，传福音是招生入学的，然后受洗是登堂入世成为正式学生的，然后教导他们遵行是开堂讲课，真正培训的。所以大使命的核心、精义、目的，不是一般的传福音，也不是一般的受洗，也不是一般的教训人，而是落实到使人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大使命的核心就是门徒培训，而且比门徒培训更深刻的程度，因为

是要教训他们遵行。大使命也不是一般的门徒培训，大使命还是师资培训，培养人按照学习的工作做师傅的。所以中世纪，也包括欧洲宗教改革，直到清教徒革命的时候，这段时期大家都是强调神权制，所以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国家，美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制度国家，要看美国的法律，We trust，最高的主权在谁的手中？在上帝手中，包括美国的效忠宣言，不是在宪法之下，不是在法律之下，不是在总统之下，而是在上帝之下。所以美国政府没有主权的，只有上帝才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讲到美国的法律，我们看到美国宪法的文件，特别是独立宣言，最高的权威是造物主赐给人，不可剥夺的权力、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力。这不是来自宪法，不是来自美国人，这是来自上帝的，来自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有的，所以说中世纪，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前，这是整个基督教王国共识的，但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逐渐占据了主导。

周小安弟兄：王牧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对你讲的一个概念很有兴趣，就是圣约神学应该成为一个神学的方式。这个成为一个神学方式，可不可以界定一下是历史神学、还是圣经神学，还是系统神学，还是某一个教义的神学方式？

王志勇弟兄：圣约神学不要只把他当做一种神学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把他当做一个范式的框架。圣约神学不光是某个时期、某个阶段、某个族群、某个信条规定的神学，而是解读整个圣经的一个范式，所以从圣约神学做一个范式来讲，不管你在什么宗派中，当你讲到耶和華，这是指的立约的上帝；不管你从哪一个神学角度，当讲到圣经的时候，圣经本身是就旧约全书，圣经是一本约书；不管你从哪个神学，当你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和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当你讲到亚当堕落的时候，就是讲到亚当的背约。讲到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在基督里也要爱人守约守法的，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从上帝、从圣经、从基督、从历史、从人，甚至从文明，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所以圣约神学确实是一个范式和框架。

某位姊妹：今天讲的是昨天的串连和总结很清楚，非常有得着。圣约的关系，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是用来成全工作之约的。另外，对于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关系，文化使命是根本，福音使命是来成全文化使命的。我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是从工商界来的，对于圣

经这一块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既然把这么大的使命给了文化使命的领域，那我想了解，文化使命具体您指的是哪一些范畴，第二，如何使得文化使命成为根本？

王志勇弟兄：文化使命简而言之就是：这是天父世界，我们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过着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生活。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国际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度，使全地、使认识耶和華的知识充满全地，像大水充满洋海。